



政治主体性、 绝对内在性和革命政治学：

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研究

宋晓杰◎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奈格里与拉克劳政治本体论比较研究”(12CZX004)的阶段性成果

D095. 465

02

政治主体性、 绝对内在性和革命政治学：

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研究

宋晓杰◎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主体性、绝对内在性和革命政治学：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研究 / 宋晓杰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8

ISBN 978 - 7 - 01 - 013746 - 9

I. ①政… II. ①宋… III. ①奈格里, A. —政治思想—研究 IV. ①D095. 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6093 号

政治主体性、绝对内在性和革命政治学：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研究
ZHENGZHI ZHUTIXING、JUEDU NEIZAIXING HE GEMING
ZHENGZHIXUE: NAGELI ZHENGZHI BENTILUN YANJIU
lib.ahu.edu.cn

作 者 宋晓杰

责任编辑 苏向平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 100706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3746 - 9

定 价 46.0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问题域 1

 一、传奇一生与思想分期 1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3

 三、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社会根源、思想背景与核心线索 5

 (一)全球化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 5

 (二)五月风暴之殇与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运动 8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斯宾诺莎和尼采在当代西方左派中的复兴 18

 (四)从纯粹客观层面的结构到革命政治学的主体性话语 19

上 篇 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双重语境

第一章 政治性与主体性: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方法论基石 25

 一、重构资本和劳动的力量关系:阶级对抗的逻辑原型 25

 (一)资本—劳动的分离辩证法:内生性对抗和替代性创构 26

 (二)价值稳定过程和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对抗性阶级内涵 28

 (三)“拒绝工作”的革命图景:总体解构与前景规划 32

 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结构:“阶级构成”的主体性路径 40

 (一)回归工人阶级立场的“阶级构成” 41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回应逻辑与阶级构成的基础性 52

 (三)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与历史演进的逻辑中轴 54

三、重组列宁思想的发展进程：工人阶级主体性模式的内在转型	56
(一)从认识论断裂到主体性断裂	56
(二)从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到工人阶级的自主性	59
(三)从生命政治到革命主体性生产	65
四、重回《大纲》：经济学语境中的政治性和主体性话语	68
(一)重建激进的政治阅读：走出客观主义范式，回归革命主体性 话语	69
(二)革命主体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经济学语境下的政治话语 ..	71
(三)共产主义实现的主体化根基：革命主体性路径和替代性政治 想象	76
(四)对抗性分离—主体性转型—创构性筹划方法论的政治 机制	81
第二章 内在性与创构性：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逻辑脉络	88
一、所属的理论传统：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当代复兴	89
(一)差异与生成：福柯和德勒兹对尼采的理论推进	89
(二)潜能与实现：阿甘本处理内在性问题的基本方式	110
二、构架的逻辑空间：内在性与超验性、创构性与调解性的对抗语境	114
(一)内在性和多样性的本体论线索：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解读	115
(二)从超验的调解权力到内在的创构力量：奈格里对抗语境中的 政治本体论	118
三、思想的逻辑取向：对传统本体论的重构与决裂	139
(一)去本体化的创构性本体论：奈格里对传统本体论的重构	140
(二)通向即将到来和自由视域的未来哲学：奈格里与传统本体论 的决裂	144

下 篇 奈格里政治本体论具体化现实化的双重线索

第三章 制宪力与宪制权：主体性的创构力量与激进的革命筹划	154
一、制宪力之“本体论的激进性”：从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到马克思	156
(一)作为绝对民主和自由实践的制宪力与指向固定秩序的宪 制权	157

(二)德行—欲望—活劳动;制宪力的主体创构性与激进革命性.....	162
(三)反乌托邦的制宪力及其后现代潜能	179
二、制宪主体与制宪共和国:创构性主体力量的生产性和革命性	187
(一)制宪主体的系谱学与作为大众苏维埃的制宪共和国	188
(二)政治的自主性与政治的社会化	192
第四章 帝国与诸众:绝对内在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革命图景	196
一、帝国的逻辑谱系与后结构主义的政治图景	196
(一)现代主权与后现代的帝国主权	197
(二)一般智力与非物质劳动	206
(三)身体政治与欲望政治	212
二、绝对内在性的诸众与游牧式的革命政治学	231
(一)游牧主体与游牧政治	232
(二)诸众之绝对内在性视域的逻辑脉络	236
(三)游牧政治与激进民主的革命空间	246
结 语 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思想史定位.....	257
一、摇摆在唯物主义和唯意志论之间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	257
二、立足充足本体论的激进民主	262
三、晚期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混合体	268
四、奈格里在何种意义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271
参考文献	278
后 记	287

导 论 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问题域

一、传奇一生与思想分期

安东尼奥·奈格里(1933—)是意大利工人主义与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他的研究涉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法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不仅在当代西方左派中独树一帜,而且极为深刻地触及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等理论和现实方面的实质问题,特别是他与哈特合著的《帝国》一书充分结合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并内在地嫁接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激烈争论。

奈格里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1933年他出生在意大利的帕多瓦。1956年以关于德国历史主义的论文获得哲学学士学位。1957—1958年与意大利历史学者卡博德共同就读于那不勒斯的克罗齐学院,从事历史学研究。1959年被选为意大利社会主义党的市政议员,并任该党杂志《威尼斯的进步》(*Il Progredo Veneto*)的主编,1963年8月,其增补部分以《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名字出版。同月,奈格里、帕奥拉·梅奥(Paola Meo)与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在工人中共同组织了一个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课程。与此同时,意大利倡导工人阶级自主的激进杂志《红色笔记》(*Red Notebooks*)分别在都灵、米兰、罗马和帕多瓦发行,奈格里、特洪迪与布罗纳等意大利左翼知识分子共同参与了它的出版。此时,还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倡导这一主题的杂志,如《工人阶级》(*Class Operaia*)和《反规划》(*Contropiano*)等。

五月风暴之后,意大利的学生与工人运动逐步走向融合,奈格里开始集中关注大型工厂的政治活动以及工会未能充分注意的问题,如安全、生产线中速度的缩减和工人纪律等。1969年秋,一批意大利共产党的左派群体相继创建,奈格里成为其中最为著名的理论家。由于意大利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进

行联合的历史妥协战略，这些激进群体不但未获得充分发展，反而于 1973 年之后逐渐自行解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奈格里基本确立了基于自主主义和工人主义运动的核心范畴和革命策略。1978 年春，他应阿尔都塞之邀在巴黎高师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大纲》的讲座，其书稿于 1979 年分别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1979 年 4 月，因红色旅对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尔多·莫罗的绑架和暗杀，奈格里以武装反政府的恐怖组织领导人之名被捕入狱，直到 1983 年夏天，在当选意大利激进党国会议员之后才因证据不足获得释放，但在同年 9 月又被迅速剥夺议会豁免权。奈格里因害怕再次入狱而流亡法国，长期任教于巴黎八大与国际哲学学院。在法国学术界的 14 年中，他不仅确立了与德勒兹在思想上的密切联系，而且成为其后来主要合作者哈特的老师，并在激进杂志《未来完成式》(*Future Antérieur*) 中扮演关键角色。该杂志由奈格里、简-玛丽·文森特 (Jean-Marie Vincent) 和丹尼斯·博格 (Denis Berger) 于 1990 年共同创办，于 1998 年停刊，正是以它为中心才促成当时法国左派的广泛联合。

1997 年 7 月，奈格里重返祖国，他努力为在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运动中被捕入狱或流亡海外的革命人士找到一个政治的解决方案，并试图说服意大利当局，但以失败告终，并再次被捕，被判处 13 年监禁，一直关在罗马的瑞比比亚监狱。在狱中，他与哈特共同完成了《帝国》一书，它不仅成为 21 世纪初最受欢迎的书之一，而且与普遍流行于当代左派中的悲观主义革命基调相决裂，深入揭示了从帝国主义向帝国的客观转变过程中新抵抗力量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与此同时，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最为重要的学术刊物《诸众》(*Multitude*) 得以创建，它在欧美学界获得较大的影响力，一系列围绕自主主义运动的研究著作开始涌现。2003 年重新获得释放后，奈格里笔耕不辍，仍然以独立撰稿人的身份活跃于当代西方思想界。从 2004 年到 2005 年，奈格里在巴黎国际哲学学院举办了十次专题研讨会，试图为后现代主义规划一个新的政治语法。值得一提的是，奈格里自 2001 年后多次访问中国，在与中国学者的学术讨论中，进一步展开并澄清了自己相关的核心范畴和思想。

总体而言，奈格里的激进政治理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在这个时期，奈格里主要基于意大利工人主义与自主主义运动的理论传统、意大利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全球左翼运动的现实状况，确立了政治本体论的方法论路径。他此时的主要论著包括《凯恩斯和 1929 年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1968 年)、《马克思论周期和危机》(1968 年)、《政治的笛卡尔：理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规划》(1970 年)、

《规划—国家的危机：共产主义和革命组织》(1971 年)、《反对工作的工人政党》(1973 年)、《无产阶级和国家：关于工人自主性和历史妥协的讨论》(1975 年)、《控制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社会转型的方法》(1977 年)、《共产主义国家理论》(1977 年)、《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 年)等。第二个阶段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在这个时期，奈格里延续自主主义运动的讨论主题和理论传统，并将其与后结构主义的内在性思潮充分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创建了政治本体论的总体构架，这也为他后来的政治批判理论确立了核心的问题域和逻辑根基。他此时的主要论著包括《时间的建构》(1981 年)、《暴烈的异例：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力量》(1981 年)、《颠覆的斯宾诺莎：(非)当代的变种》(1985—1998 年)等。第三阶段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在这个时期，奈格里基于其政治本体论，逐渐展开他对一般政治问题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深入思考，力图构建后现代主义的革命政治学和后社会主义的解放理论。他此时的主要论著包括《叛乱：制宪力和现代国家》(1999 年)、《帝国》(2000 年，与哈特合著)、《诸众：帝国时代的战争和民主》(2004 年，与哈特合著)、《无产阶级的专题研讨：一个新的政治语法》(2007 年)、《联邦》(2009 年，与哈特合著)等。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在意大利本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奈格里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仅有的几部研究著作也未对其思想发展的逻辑脉络进行深入剖析。他的国际声誉应真正始于《帝国》一书，国内外学界大都以它为基点，开始推进对自主主义运动的研究。依据作者所能查到的资料，西方学界涉及奈格里专题研究的著作主要有 29 部，其中硕士或博士论文 4 部、传记 2 部，英文 9 部、德文 8 部、意大利文 4 部、西班牙文 7 部、葡萄牙文 2 部、法文 2 部(包含被译为不同语言的同一部著作)，主要集中在 2000 年《帝国》一书的出版之后，讨论的主题也主要围绕《帝国》及其之后的文本。关于奈格里的研究论文主要有 88 篇，同样集中在《帝国》一书的出版之后，其中英文 75 篇、斯洛文尼亚文 6 篇、德文 5 篇、法文 1 篇。他的著作除去意大利语的 53 种版本外，其核心文本也相继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斯洛文尼亚语、葡萄牙语等多种文字，共计 220 种之多。另外，关于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网络资料和文献索引也相继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2 年，奈格里著作的英文版本已达 41 种，一批围绕

奈格里思想的论著不断问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帝国的新装：阅读哈特与奈格里》、《帝国与帝国主义：对哈特与奈格里的批判性阅读》、《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哲学：实践中的抵抗》、《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哲学：理论的革命》、《自主的筹划：内在且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与建筑学》以及哈特的博士论文《组织的艺术：德勒兹与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基础》等。总体而言，国内外的研究主题集中在五个问题上：(1)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运动；(2)奈格里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的理论传统；(3)本体论思想的来源、特征和构架；(4)创构性原则和制宪力理论；(5)帝国—诸众政治的核心逻辑和结构困境。这些研究虽然系统追踪了奈格里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发展逻辑，充分肯定了它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并在不同理论视域中揭示了其结构困境问题，为奈格里思想的解析和定位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平台，但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1)讨论域过于集中在诸众政治，缺乏与政治本体论的结合，未能充分认识后者的基础地位。(2)未能深入揭示政治本体论的多重语境，以此切入奈格里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审视，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对之系统定位。(3)未能理清政治本体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总之，国内外学界非常缺乏以宏观的马克思主义图景深入考量当代左派政治本体论的关系谱系，同样非常缺乏关于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深入研究。虽然不乏讨论其他思想主题的上乘之作，但因对激进政治理论的本体论转向的忽视，导致作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一直处于引而不发的尴尬状态。

五月风暴革命性的乌托邦精神和文化启蒙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为左翼思潮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新的反思起点和激进根基。晚期的阿尔都塞意识到，事件秩序、机遇和偶然性必须被本体地铭刻在最终导向革命政治本身可理解性的构架中，由此拉开了一批激进政治理论的本体论转向。奈格里政治本体论将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径纳入一个全新视域，重估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主流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构架，并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深入清算，在后现代视域引入阶级斗争，力图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揭示无产阶级力量的本源性和共产主义成熟的基本条件。它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生产、现代政治传统和革命政治图景均作了极富创见的理解，从而在当代左翼阵营中占据了不可取代的位置。

研究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它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视域中重构了传统的本体论类型、劳动和资本的力量关系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结构,而且创建了一个基于绝对内在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理论。它立足对《大纲》的深入挖掘,旨在超越正统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逻辑取向上的深层困境,并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协调起来。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中国化注入了一定的理论生命力,并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内容、考量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审视西方激进政治运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2)奈格里建基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以对劳动力量的持续关注,致力于寻找新的革命主体,其政治本体论实质性地触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和危机的本质问题。这既对反思激进政治理论和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关涉当代马克思主义合法形态的重大社会命题。(3)深入比较奈格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式,重回历史唯物主义复兴的时代命题,理性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引发的连锁效应,对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4)在思想史框架中对之进行系统定位,并勾勒出新左派政治本体论的关系谱系,能够完善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景性认识。(5)国内学界对于工人主义与自主主义运动的探讨尚处于起始阶段,对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理论空白,并为深入审视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平台。

三、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社会根源、思想背景与核心线索

毫无疑问,奈格里始终不是一个处于书斋中的空想家和纯粹的形而上学思辨家,他一直立足于意大利本土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发展情势,并在与当代西方左翼激进运动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中,以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史构架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逻辑参照系,推进自己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激进政治的深入审视。在其一生中,他始终持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理论立场和现实态度,并以此对社会现实和不同的观念形态不断进行批判和超越,绝非对某个具体思想终其一生的单纯注释者。在这个意义上,奈格里的政治本体论必然拥有充分的社会根源、思想背景和现实意义。

(一) 全球化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

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

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显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潜能未完全发挥出来之前是绝对不可能轻易自行解体的。处于全球化时代中的资本主义，不仅调整了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有效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模式和剥削形式，而且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它们的追踪和反思必将成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寻求革命可能性的基本前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揭示，清晰地描述了资本的本性如何创建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即“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满足于现在需要和重复旧有生产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力力量的限制”^②。由此，全球化视域中生产、劳动和资本的构成方式和表现形式必然构成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和统治形式的现实切入点。

处于后冷战时代的资本主义，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在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第三条道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调节中，焕发出看似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呈现出一系列社会结构的深层转变，主要以生产方式由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为特征。对调节学派的阿格里塔、利比兹和博耶而言，这个转变既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跃迁，还包括与其相应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变化。福特制出现在 1945—1973 年，它主要采用详尽的劳动分工和科层管理，使工人的操作简单化和标准化，以实现大规模生产效益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后福特制则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后，以“第三意大利”产业集群、丰田的“精益生产”模式以及美国硅谷开放型、网络化和虚拟化的生产模型为标志。它有效缓解了福特制生产和消费的刚性结构，强调技术化、自我管理以及社会化的人力资源和信息交流及其共同协作，侧重于寻求弹性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需求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而非具体化、简单化的劳动分工、单一的规模化生产和范围经济，同时满足了大规模生产和多样化需求。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生产社会化和资本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过程日趋知识化、网络化和虚拟化。跨国公司成为生产国际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一体化程度日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3 页。

增强,国际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开始在世界市场中占据核心位置。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逐步转向信息产业部门,所有制形式和管理方式不断调整,并普遍确立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其次,社会阶级结构日益复杂化,伴随新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逐步兴起,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原本以福特制为背景的大众化、规模化的半熟练的生产工人逐渐被技术化社会化的工人所取代,原本大规模的劳资对抗和劳资关系中工人的弱势转变为资本对技术工人的依赖程度日重。最后,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价值信仰和道德规范体系普遍缺失,技术理性和权力操控已全面渗透至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奈格里通常借用马克思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形式吸纳”)向“实际上的从属”(“实质吸纳”)的过渡来描述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社会转型。正是资本主义当代变化引起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力量改变,导致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出现了危机,奈格里为充分认识这些危机和不断改变的社会现实,开始重新定义存在概念,并逐渐从社会学的探讨转向本体论的讨论。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中,与这个语境密切相关的讨论域主要包括五重核心语境。第一重语境为“晚期资本主义”的问题域。曼德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六大自主变量为中介,借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论断,透视晚期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固有局限问题,他指认的晚期资本主义与阿格里塔的福特制资本主义更为接近。杰姆逊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为核心框架,策略性地将资本主义当代新变化确认为跨国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并把后现代主义当作它的文化形态,这更接近以后福特制为背景的全球资本主义语境。第二重语境为消费社会理论。阿格里塔分别描述了泰勒制、福特制和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特点,认为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严格对应于福特制的劳动过程,它以高度社会化的消费为特征,是由雇佣关系的普遍化造成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弹性生产的劳动过程则必然导致雇佣关系和社会化消费的巨大改变。鲍德里亚则试图以象征交换的逻辑取代生产的逻辑,将“消费社会”当作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第三重语境为全球化和金融资本问题。哈维把金融资本膨胀当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向弹性积累模式转变的主要特征,资本积累因其在时空压缩格局中实现的充分灵活性,使金融资本获得相对于生产资本更大的自主性。阿瑞吉则把资本扩张概括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物质资本扩张与金融资本扩张,前者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而逐步过渡到后者,表现为金融资本为获取高额利润所实现的跨国流动。第四

重语境为新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问题。阿明认为，全球化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资本战略的意识形态话语，代表着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和永久特征的帝国主义自身。福斯特把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和集中化、金融资本的国际化、帝国主义“中心—边缘”格局的加剧、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等特征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等同。哈特与奈格里则以内在性的平滑政治学和马克思的实质吸纳理论为逻辑中轴，以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为主线，充分结合后结构主义的政治图景，把全球性的生产流通和主权形式定位为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过渡。第五重语境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奥康纳认为，全球化的极限扩张招致的矛盾和危机主要表现为资本—自然的矛盾和因资本增值破坏自然造成的流动性危机，尝试以推进生态为内容的共同性公共领域以及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民主化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在福斯特看来，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体制的“全球‘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才构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试图通过一种道德革命的方式来抵制这种生产方式。利比兹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社会母体固有的矛盾和差异，极有可能造成经济关系再生产过程的直接中断，从而引发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他坚持认为当代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调节模式即“自由—生产主义”（新自由主义）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性，并致力于政治生态学的构建。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对生产要素、社会关系以及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重组使资本主义的总体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转型，然而，这是否直接宣告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典论断的过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已经突破了自身的固有界限？全球化视域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将如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实质？全球化时代的革命主体和狄奥尼索斯潜能又将立足于什么立场来揭示？这些问题构成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的核心论题。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寻求新革命主体和社会本体力量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一直都是贯穿他研究始终的方法论线索。

（二）五月风暴之殇与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运动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对于整个西方激进政治运动和激进思潮而言，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20世纪50年代，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整个社会主义思潮的逐渐左倾化，法国“新左派”运动得以出现。他们在审视苏共二十大、布拉格政变等事件的基础上，深入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背离，试图在社会的政治革命与个体的日常生活革命、社会解放与个人解放、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以及作为社会变革者主体的无产者与作为社会改造推动力和新型革命主体的技术工人、

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边缘群体之间的历史转换中实现对传统左派的超越。在它的影响下,左派学生组织和法共内部左翼力量逐渐壮大。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法国正处于战后飞速发展的时期,物质财富的迅速累积以及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加速转型共同激化了物性逻辑高度发展背后的固有限制和潜在危机,充裕的物质财富与陈旧保守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开始考验法国人具备强大创新精神和浪漫主义情结的革命意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五月风暴是一场丰衣足食的反叛。此时的法国国内,经济危机的出现、小农经济的破产、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受剥削程度日益加深以及失业人口和大学生就业人数的剧增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这直接造成罢工风潮和学生运动的兴起。与此同时,1967年,意大利爆发学潮运动,1968年2月,西柏林和法兰克福的学生与警察交火。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1967年在玻利维亚的牺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五月风暴的爆发。1968年5月,一场声势巨大的社会运动席卷整个法国,不仅引发全国性的总罢工,直接导致国会改选、政府下台,而且促使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如萨特、列斐伏尔、阿隆、列维-施特劳斯、福柯、拉康、巴特、鲍德里亚、德勒兹、布迪厄、曼德尔、德里达等开始走向社会政治运动的舞台,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毛主义逐渐被众多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1968年6月30日,随着最终选举结果的公布和戴高乐政府对法国的重新掌控,五月风暴才得到平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法国极左革命理论的式微、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红色高棉的种族大屠杀使西方激进运动背负了极强的负罪感和赎罪意识,原本坚信的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面对历史真相的拷问失去了应有的能动力,从而阉割了其固有的反叛性和超越性,西方激进政治活动开始步入低潮。

严格说来,五月风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它源于复杂的现实原因和庞大的人类思想资源,还指向了对人类文明和启蒙精神的深入反省和清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和参与民主运动的序幕。贝内东和图夏尔从“颠覆活动”、“大学危机”、“头脑发热的青年造反”、“精神反抗,文明危机”、“阶级冲突,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传统性质的社会冲突”、“政治危机”和“各种因素的偶然遇合”等多重层级来分析五月风暴所引发的综合性社会危机,^①从而使五月风暴展现出极为

^① 菲利普·贝尔东、让·图夏尔:《对1968年5月/6月危机的解释》,汪民安主编:《生产》(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81页。

丰满的人文气息。莫兰则把“五月”比作“既是一场游戏又全面平等”的“游乐场”，并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而对于保守的右派雷蒙·阿隆而言，五月风暴只是“一场幻想”^①、没有目标的头脑发热的事件和破坏性的或虚无的假革命，是法国人自1789年以来放大革命意义的行为惯习，正是从这些危机中，他们体验到了平等的幻觉和革命的狂喜。

罗伊将五月风暴的精神描述为“陶醉的混合物、混合着各种成分的爆炸性鸡尾酒”，它是“反对旧有秩序、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社会的野蛮等级、宗教家庭、殖民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强烈的愤怒。这种怒气、抗议、愤慨伴随着对于权威、官僚机构和政党的深深的不信任；它能带来浪漫的、乌托邦的和革命的形式，能激起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或激进民主政治的潮流，但是它高于任何政治立场。事实上，在概念的辩证性含义中，这样一个否定性的时刻是任何社会改革运动、任何叛乱或暴动的必要起点”，是“一场在前现代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名义之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② 五月风暴的真正遗产恰恰在于其革命性和批判性的乌托邦精神和文化启蒙，它为当代左派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反叛资本主义的反思起点和激进根基。与这个背景密切关联，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运动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奈格里也是在这个时期才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并且其政治理论的本体论转向，显然也与这个事件紧密相关。

哈特指出，自1968年之后，把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的激进组织遍布意大利，“为获取社会深度改变的需求和乌托邦的强烈愿望，被迅速推向日程上来。奈格里和他的同事们必须努力向上以向这些斗争看齐，尽力理解正在改变的社会现实。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没有正在证实意大利版本的俄国1905年革命（某一未来事件的彩排）。相反，他们‘四月的日子’是拉开革命的直接序曲。他们认识到，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为了澄清并赋予大众斗争的方向以理论一贯性，从而能够推动其目标，构建集体行为新出现的标准；他们在斗争的激荡中寻求秩序。更进一步而言，他们担负着实现由意大利的异例所代表的独特可能性的责任：‘任何事物都依赖我们，在这里，工人阶级是最强大的’。”^③ 重视工

^① 基斯·A. 里德尔：《1968年5月发生了什么》，汪民安主编：《生产》（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② 米歇尔·罗伊：《“五月风暴”的遗产》，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3期。

^③ Michael Hardt, “Into the Factory: Negri’s Lenin and the Subjective Caesura”, *The Philosophy of Antonio Negri: Resistance in Practice*, Timothy S. Murphy and Abdul – Karim Mustapha (ed.),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7.

人阶级斗争，重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坚持大众革命的基层运动方式，使他们表现出意大利左派运动前所未有的激进实践倾向。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验总是带有鲜明的政治紧迫性，其思想实验与革命实践之间相互推动的开放关系必然使他们保持对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阶级现状的清醒认识。

1968 年都灵菲亚特工厂工人运动的迅速激化和法国五月风暴构成意大利激进政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1917 年十月革命所暗示且国际解放的连续斗争以持久方式未能获得的东西，被 1968 年事件揭示为集体意识和行动的直接可能性”，它们“展现了被连续地设置以控制世纪之初革命运动的社会契约的脆弱性”，揭示了“旨在消除或废弃资本主义制度对抗矛盾的社会妥协的失败”。1968 年事件充分说明了生产性质和工作程序的社会转型及其根本矛盾，并赋予人性以巨大的生产能力新的无产阶级命运，后者起源于资本通过去地域化的生产形式和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而实现对无产阶级的永恒控制。其根本力量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反对剥削的反叛，目标不只是解放，而是跨越移除明显的个人链条之真实的自由”，并通过“将共产主义重新界定为共同体和意识的多样化和富足”而标示了“革命周期的重新开启”。^① 奈格里同样借用“实质吸纳”来指认 1968 年事件所标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获得了霸权，而且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形式也变成一个唯一的存在。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或者说，工厂扩散至整个社会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是社会的，所有的活动都是生产的。”^② 这既是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拓展分析，又与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的“生命政治”和德勒兹的“控制社会”表现出极大的相关性。

托比亚斯·阿别斯指出，“在西方社会，没有哪个国家像意大利这样持续不断地从基层爆发激进运动，其猛烈程度不断让观察家吃惊；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意大利这样保持了那么漫长而具有连续性的彻底的保守统治”^③。严格来说，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运动是对 20 世纪 50 年代劳动运动危机的政治回应，它在时间上先于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至 60 年代的新左派运动。意大利共产党早在 1921 年便由葛兰西和陶德亚迪共同创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才

^① Felix Guattari and Antonio Negri, *Communist Like Us*, New York : Semiotext(e), 1990, pp. 20 – 29.

^② Antonio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1989, p. 204.

^③ 托比亚斯·阿别斯：《意大利：新的议程》，佩里·安德森、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张亮、吴勇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3 页。